

常连霆　主编

中共山东专题史稿

第三辑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常连霆　主编

中共山东专题史稿

第三辑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山东专题史稿/常连霆主编；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4
ISBN 978-7-209-08196-2

Ⅰ.①中… Ⅱ.①常… ②中… Ⅲ.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党史—山东省 Ⅳ.①D23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3046 号

责任编辑：李怀德

中共山东专题史稿(第三辑)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常连霆 主编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市场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70mm×240mm)
印 张 43
字 数 6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8196-2
定 价 360.00 元(全三册)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0531)82079112

第三辑

目　录

阶级视域下的中共组织成份研究
——以抗战时期山东党组织为中心的探讨 …… 1
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国统区、日伪区的农民负担比较研究 …… 104
山东抗日根据地农业经济政策研究 …… 197
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整合执政资源的实践路径与基本经验
…… 264
革命动员与乡村变迁
——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 309
统一战线视角下的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研究 …… 356
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化建设研究 …… 407
抗战文艺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动员(1937—1945) …… 459
价值重构与社会转型:山东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研究(1937—1945)
…… 509
群众观视野下山东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文艺建设及其当代影响研究
…… 552
党在沂蒙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 609

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党群关系研究
——以社会资本为视角 …… 639

阶级视域下的中共组织成份研究

——以抗战时期山东党组织为中心的探讨

山东省社科规划党史专项课题组

摘要:阶级分析某种程度上可视作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锁钥。在大量占有资料基础上,运用跨学科理论分析和逻辑分析,可还原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壮大概况,探讨阶级观念如何渗入党员工作和生活。抗战时期,山东党组织经历了初步发展、飞速发展、巩固发展几个阶段。伴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变化,山东党组织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党员构成而言,知识分子党员在党内的地位逐渐式微,贫雇农党员在党内的地位逐渐上升;阶级观念渐次渗入农民党员生活,与中国农民既有的"理性"、"道义"观念相互作用,成为影响农民党员的重要因子。

关键词:阶级;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山东党组织;知识分子党员;农民党员;政治运动

引言

本报告研究内容涉及中共山东历史、中共组织史两个层面,兹从这两个角度梳理既有的学术研究。

1. 中共山东历史:抗战时期中共山东历史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集大成者为《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卷)》(中共省委山东党史研究室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该著第三章专门研究抗战时期山东党组织,系统梳理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发展、巩固、建设等问题,并对抗战时期山东各地武装起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扫荡"、土改、整风等若干问题进行了论述。

对抗战时期中共山东历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1)重要历

史人物研究。如《1942年刘少奇的山东之行》(申春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4期)等。(2)重大历史事件研究。如《略论山东抗日武装起义的特点》(陈荣勋等,《齐鲁学刊》1987年第5期)等。(3)根据地史研究。如《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合理负担政策》(朱玉湘,《文史哲》1985年第5期)、《朱瑞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初创》(付庆敏,《长白学刊》2007年第6期)等;(4)中共组织史研究。如《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地方组织机构沿革》(魏训洲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2. 中共组织史:中共的组织形态研究成果也较为突出。学者们多从宏观视野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党务。宋晓明主编的《中共党建史》(党建读物出版社1996年版)系统论述了建国前中共的党建活动。该著第四章探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从宏观上考察了抗战初期中共在政策调整背景下党的发展、巩固概况,并探讨了毛泽东的党建思想。此外,涉及中共党务的著作还有《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赵生晖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共产党建设史》(杨钦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共产党党务管理史纲》(王韶兴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

从区域和基层视角审视中共组织形态的代表性文章为《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载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该文从组织形态维度考察了1927—1932年间的中共广东党组织,探讨了党员的社会构成、基层党支部、党费缴纳、党内交通、党组织的地域化等相关问题,指出了此时中共广东党组织存在组织涣散、农民化倾向、阶级意识不强等弊端。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抗战时期的山东共产党》(李里峰,《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考察了抗战时期山东党组织的党员吸纳机制和审查巩固等相关问题。该文特别注重考察山东党组织在基层的运作机制,具体而微的带领我们接近了历史的现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支部研究: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例》(李里峰,《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8期)则分析了抗战时期山东农村党支部的组织状况、支部整理等问题。

李里峰所著《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则为中共组织形态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该著对抗战时期干部群体、党员群体、党员的吸纳机制、基层党组织、党的效能等问题均有涉及,且多有新见。《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共农村党组织研究》(李秉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以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共农村党组织为研究对象,就党员入党动机、党组织巩固、政治运动中的党组织、党群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总体而言,抗战时期中共山东历史研究取得了不俗成效,但仍存在一定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研究内容较为陈旧。多数学者仍将关注点放在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山东抗日根据地层面,研究内容的陈旧制约着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甚至出现了研究题目的重复和雷同,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学术研究的"内卷化"。就研究内容而言,令人眼前一亮的题目较为罕见。(2)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多数学者的研究采用的是传统的宏观视野,缺少研究的微观视野。学者们多采取由上而下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瞩目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甚少关注基层民众的生活。注重政策的制定和颁布,缺乏对制度实施运作过程的关注。

令人欣慰的是,部分学者开始采用新的方法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前文提及的王奇生、李里峰、李秉奎等人的论著均尝试从基层组织角度审视中共地方党组织,无论从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论著均有新意,代表着当今党史研究的较高水准。但上述论著仍存在一定不足:如李里峰之作对当时时代背景缺乏分析,没有具体划分时段而分别考查中共组织形态的变化。在考查党组织时对不同区域(我战区、游击区、敌战区)缺乏必要的说明,诚为憾事。这些遗憾成为本报告努力的方向。

中共组织史研究已突破了传统组织史研究重宏观轻微观、重制度轻运作、重普遍轻特殊、重精英轻大众的弊端。前举优秀之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党史和历史研究的趋势:关注草根阶层;注意区域差异;考察社会制度在基层的运作。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中共组织史研究的突破得益于新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中共组织史研究有可能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

(1)跨学科研究。当今学界,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中共组织史研究可以借鉴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打破学科壁垒,丰富中共组织史研究。李里峰借助经济理性的概念,具体分析了党组织介入农村生活后农村各阶级的政治反应和行为选择(《'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颇具新意。这为我们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2)研究视角。中共组织史研究内容不外乎组织路线的制定与实施、党员吸纳、党员群体、党纪执行等层面。这需要找寻新的视角来将这些内容有机串联。新的视角不仅需要串联各研究内容,还要与中共的政党文化紧密相关。这决定了选择视角的重要性和艰难性。笔者以为,"阶级"可视为深刻反映革命年代中共政党文化特征并能贯穿中共组织形态的可行性视角。

(3)研究方法。A. 田野调查方法。组织史研究已经体现出研究对象转移的趋势,其关注的焦点指向基层大众。中国传统史学关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上流社会群体,对基层民众的生活缺乏必要的记载,文献史料不足成为制约基层民众研究的关键。这需要我们走进田野,求教历史当事人。在倾听"亲历者"、"亲见者"、"亲闻者"基础上,结合文献材料,梳理基层民众生活。B. 比较研究方法。中共中央制定的制度可能面向全国,但具体到各根据地便产生了各种实践层面上的差异。制度与运作脱节的现象是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关切点。因此,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可能是未来中共组织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就抗战时期中共组织史而言,既要考察抗战时期山东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的变化,又要关注其他省份共产党组织形态的变迁,特别要注意区分抗日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等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即使在山东省内考察,也要注意比较不同区域共产党组织形态的变化,注意区分我战区、游击区、敌占区的不同情形。

本报告以"阶级"为视角讨论抗战时期山东党组织,拟解决两个问题:(1)党组织的成份构成及其变化。(2)阶级观念如何渗入基层党员的生活。

(1)党组织的阶级构成及变化问题。中共自视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和被剥削阶级的代表,基于这种理念,党内理想的阶级构成应该是产业工人占绝对比重。但中国机器大工业的落后和抗战时期中共立足于农村的客观形势决定了产业工人在党内的比重微乎其微。中共将发展的重点遂转向"农业工人"(农村中的雇农)和贫农、中农。抗战初期,知识分子党员在党内居于核心地位。到了抗战中期,知识分子在党内逐渐式微,贫农、中农尤其是贫农地位提升,在党内占有绝对比重。本报告拟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

(2)阶级观念如何渗入基层党员的生活问题。抗战初期,阶级观念在党组织吸纳党员、武装民众方面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进入抗战中期,阶级观念逐渐渗入党员工作和生活,成为基层党组织巩固、成份调剂、政治运动中的重要标杆。本报告尝试分析在党组织巩固和政治运动中,农民党员如何在本身固有的"理性"、"道义"原则和党员应具备的"阶级"原则之间纠结。基层党员如何逐步抵消自身的农民特性,逐渐接受了外来的"阶级"观念。

本报告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跨学科研究和文献分析方法。(1)跨学科研究。报告借用了西方学界研究农民问题的两个基本理论:"理性"小农和"道义"小农。中国农民兼具"理性"和"道义"特征。抗战期间,"阶级"观念也逐步渗入农村。在一些政治运动中,农民党员本身固有的传统乡土属性的"理性"和"道义"观念和党组织要求的"阶级"观念互相作用,影响着农民党员的行为选择。(2)文献分析研究。报告以山东省档案馆收藏的抗战时期中共革命档案为主,辅以山东省档案馆整理的《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和地方党史资料等相关资料,共同构成报告的文献基础。在大量占有资料基础上,运用理论分析和逻辑分析,还原抗战时期山东党组织在山东的发展、壮大过程和党员的阶级构成变化,探讨阶级观念如何渗入党员工作和生活。前面提及的其他研究方法限于时间、精力,明显不够,尚待日后加强和完善。

一、阶级概念及抗战前山东党组织概况

(一)阶级的定义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指导,在革命年代奉行阶级斗争理念。欲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组织形态,必先明了阶级斗争的含义,尤其是"阶级"的内涵和外延。

近代中国的阶级话语或阶级斗争观点是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入、传播而展开的,其基本思想来自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学派的"学理"上的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两大基石。后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经济对立的根源,但由于近代中国缺乏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这一基本学说的实用性质和实施范围都非常有限",而"直接决定或支配其实际行动的,更多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中,又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①。此正如毛泽东自己回忆所言:"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②。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将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完整地统一起来,认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③。这一主导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观点,却在改革开放后引起了一定质疑,"什么是资产阶级、资本主

①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152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8—379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87 页。

义？什么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呢？由于没有进行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研究，这种种概念和观念便始终处在非常模糊朦胧的状态中。它无所不包却似是而非”①。因此，我们必须先回到原点，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的阶级观点。

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写道：“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②；“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这一响亮观点的提出，就把阶级的产生和阶级斗争学说奠定在唯物史观这一坚实基石之上。“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它是“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的，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恰恰造就了阶级消亡的必要条件。总之，经典创始人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一种系统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对人类社会阶级的起源、不同阶级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阶级消亡的一般历史前提等涉及阶级斗争学说的一般理论进行了详尽的理论阐释，被誉为“阶级斗争学说的真正创始人”④。

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

①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2、525、632页。

④ 王学典、牛方玉：《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阶级观点问题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趋势,认为现代社会已日益使得阶级对立简单化了,即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对立,并预言无产阶级将上升为新的统治阶级。“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即是说,“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①。这里,马克思对阶级的划分和对不同阶级所起的历史作用的分析,是紧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封建主和中间等级说来,在这里是被当作革命阶级看待的,而封建主和中间等级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说来是革命的,因为无产阶级本身是在大工业基地上成长起来的,它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②。

对之,列宁曾深刻的指出,正是马克思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商品经济体系这一形态进行了详细研究和分析,从而“使人们有可能看到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③,正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划分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列宁给阶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④。列宁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为,“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是阶级社会中阶级分化最明显的结果,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则为阶级划分的首要标准,“阶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别人的劳动。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①。这就是列宁关于什么是阶级以及怎样划分阶级的一系列基本观点,而运用这一理论去解释历史、分析社会现象,就是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阐述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根据经典作家的相关解释,我们认为,阶级是指在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特定生产方式下,因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发挥不同作用、进而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占有或支配的权利不同,从而具有不同思想和行为取向的社会集团。

我们探讨的是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发生的场域主要是山东的农村,因此应特别注意农村社会主要组成部分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社会阶级。抗战初期,在乡知识分子也相当活跃。我们也需要考察这些边缘知识分子阶层。因此,本报告着重考察边缘知识分子党员、地主党员、富农党员、中农党员、贫雇农党员等社会阶级。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0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二)抗战之前山东党组织概况

中共成立初期,力量较为薄弱。中共一大时,全国党员仅50余名。1921年,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8月,中共济南地方党部成立,王尽美任书记,时济南支部成员共9人[①]。此后,山东一些地区也开始建立党组织,组织规模缓慢增长。1924年,国共合作后,山东党组织规模有了一定数量的发展。到1926年7月,全省共有党员515名。到大革命失败前夕,全省共有党员1500余名,支部近200个[②]。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苏维埃暴动。山东等地虽发生阳谷、高唐、日照、文登等地暴动,但这些暴动很快遭到镇压。山东党组织屡被破坏,仅省委机关在1929年2月至1933年12月便遭到十余次破坏。1934年后,甚至全省的领导机关一度阙如。在黎玉、赵健民等人的努力下,山东省委于1936年5月重建,黎玉任书记。大革命时期,中国革命中心在南方,作为革命的边缘地区,山东党组织规模较小。1931年2月,全省共有党员390名、共青团员108名。到1932年12月,全省约有党员900余人,团员533人[③]。

建党初期,中共党员几乎全部为知识分子[④],党内充满着"书生"气息。知识分子在山东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早期的核心党员如王尽美、邓恩铭皆系知识分子。在各地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扮演着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六大后,中共开始强调党内成份,特别强调工人阶级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央也选举出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作为党的掌舵人。但中共组织运作对党内文件的依赖

---

①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②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山东地方史》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4页。

③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山东地方史》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115页。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页。

性等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仍然是党内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很多地区和部门出现了“秘书专政”的局面。知识分子在党内依旧居于核心位置。

1. 知识分子党员

就山东党组织而言，在三十年代前中期，知识分子党员系党组织的灵魂。他们是地方党组织建立、恢复的中坚力量，是党组织的重要构成部分。

知识分子党员是地方党组织建立、恢复的中坚力量。面对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共产党员坚定信念，利用一切条件建立、恢复党组织。这其中，知识分子党员在各地党组织的建立、恢复过程中扮演着决定性作用。文登党组织成立于1931年。时党组织分头发展，共约四条线索，核心人物分别是宋澄、于云亭、张连珠、于荣瑞，均为知识分子[①]。1933年暑假，济南乡师学生姚梦龄回原籍东阿县盖楼小学任教，从学生中发展了苏广才等十几名党员，建立了东阿县第一个党支部。1933年底，济南乡师学生赵健民回原籍冠县吸纳冯干才、钱洪勋等入党，分别建立了省立寿张乡师党支部和冠县党组织。赵健民还在省立聊城师范发展了部分党员，重建了聊城师范支部。济南乡师学生王传武回原籍寿光，为陈少卿等恢复了组织关系，建立了寿光支部。1934年底，鲁西地区的寿张、冠县、聊城、阳谷等地的党组织逐渐壮大，并在临清、堂邑、莘县、茌平、博平等地发展了部分党员。为整合鲁西党组织，1935年春节，鲁西地区的党员代表齐聚堂邑，在济南乡师学生赵健民主持下，组建了中共鲁西特委，由中共济南市委领导[②]。1936年5月，山东省委重新建立，黎玉任省委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林浩任宣传部长，三人均为知识分子。省委重建后，立即着手恢复、整顿全省党组织。具体做法是选调一些党员干部赴各地恢复失去联系的党员关系，发展新党员，恢复、重建基层党组织。这其中，知识分子党员发挥了核心作用。1936年秋，济南高中毕业生林浩毕

① 《文登党组织的初创及其发展》，《烟台党史通讯》1986年第1期，第10—11页。

② 张凯军主编：《坚强的战斗堡垒：中共济南乡师支部》，（内部出版）1991年，第14—15页。

业后到费县师范讲习所工作,以教学为掩护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林浩先后发展学生王宗一、崔晓东、李祖恩、李堂彬等十多人加入组织。10月下旬,林浩主持建立了中共费县师范讲习所支部,并于11月主持建立了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①。1936年7月,济南乡师学生高启云、孙毅民等奉组织之命利用暑假回到家乡临朐县开展党的工作。高启云在赵家楼村发展堂弟高奋及村民高德福、高明臣等入党,建立了赵家楼支部。孙毅民在孙家小崔村发展孙清兰、孙海兰等入党,建立了孙家小崔村支部②。正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努力,30年代前中期的山东地方党组织才得以恢复和重建。

知识分子党员亦是党组织的重要构成部分。大革命时期,党员处于秘密工作状态,党组织经常遭到破坏,全省范围的党员统计工作很难进行,更妄谈党员成份构成的统计。某些地区的党员成份统计表明,知识分子党员数量较多,是地方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之前,鲁中地区党员成份大多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界人士。莱芜党组织中,小学教员约占1/2,工农成份约占1/2③。截止到抗战爆发,鲁西北各县均有了党的组织,党员多为知识分子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学校尤其是师范学校党组织的规模较为庞大,人数较多,构成地方党组织的主力军。"七七"事变前,济南乡师在校党员多达70余人⑤,而时济南市党员人数约150名⑥,仅济南乡师的党员人数就占整个济南党员人数的一半。济南是山东文化重心,学校众多,而当时中共非常注重在校

①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鲁中地方史(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94—95页。

② 《中共鲁中地方史(1919—1949)》,第95页;谭家昌:《鞠躬尽瘁、堪称楷模:记高奋同志战斗的一生》,载中共潍坊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潍畔英豪》,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页。

③ 《鲁中区党委五年组织工作总结》(1943年3月),山东省档案馆藏,编号为G027—01—0020—001。以下档案均为山东省档案馆所藏档案,仅注题名和档案编号。

④ 谢玉林、李冬梅:《鲁西北抗日局面的开辟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聊城地区党史资料资料》1983年第4期,第204页。

⑤ 《坚强的战斗堡垒:中共济南乡师支部》,(内部出版)1991年,第29页。

⑥ 中共济南市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济南市组织史资料(1921—1987)》,济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